

齐鲁名士

1944年，他当选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，75岁高龄时入党。渤海区党委命名一所学校为“植庭学校”。

友赠：“勤一生，俭一生，勤俭一生；教到底，学到底，教学到底。”

李植庭：扒了娘娘庙也要办学校

□ 本报记者 卢星
本报通讯员 宋梅臻 高博

夏至日，适逢阵雨过后，寿光市田柳镇崔家庄村西的植庭学校里，花木扶疏，湿润苍翠。大院中，两株一抱粗的合欢树，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天棚，粉红细丝般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舞。

远处望去，合欢树像绿云层上浮着的团团红雾，绿云红雾洋溢着独特的芳香。走近，合欢树下是建于1946年的大礼堂，三间老屋陈列着这所学校筚路蓝缕的历程，伴随着开启寿光近代教育之山林的先行者——李植庭的一生足迹。

倒欠十吊钱的“双凤”校长

“李老1871年出生在我们崔家庄村，他一辈子都在办学，从1903年直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。有人称他是当代‘武训’，他的办学精神确实有点像武训，但他办的是学科学，反封建的新学堂。”据寿光二中退休高级教师李尊然介绍，李植庭晚年时认为自己比不上武训，“人家武训是倾其所有，我至少还有大家庭，跟他比差得远啊！”

幼时读过几年私塾的李植庭，最初在崔家庄任私塾老师。面对当时羸弱国家、凋敝社会，他不满继续教授学生“忠君”“子曰诗云”那一套，早早意识到救中国得办学堂、学科学，维新图强。那时，他便注意把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，引导学生思考。

可当时封建束缚如“铁屋子”一样，压得他寸步难行。反复思虑后，他终于在1903年离开故土，远闯关东，在铁岭近郊的农村办起初等学堂，教学生读地理、历史，学习笔算，第一次实现了他的志愿。后来，他常对人说：“我下关东不是因为家里揭不开锅，而是为了办新学才去的。”

民国初立，除旧布新，李植庭返归故里，倡办学堂。可在当时日渐败落的农村，想立足真要动番心思：群众不支持，他挨门挨户宣传动员；没有校舍，他向有闲房的人家去借；缺少桌凳，他发动学生自带；经费不足，他提出“集资兴学”大家凑。

经过不分昼夜的工作，李植庭终于在1913年冬办起小学，招收学生32名，自己担任教师，取校名“双凤学校”。“当时王高乡有‘凤鸣学校’，李老当时是想让两所学校双凤齐飞。”李尊然介绍道。

李植庭虽是“双凤”老师，却不要“工钱”，甘尽义务。“他对学生关心备至，向学生灌输新思想，动员学生剪掉长辫子，学习科学知识，废除体罚，对学生不打板子不罚跪，在生活上像关心自己子女一样。”李尊然介绍道。

这些新变化受到学生家长的衷心拥护。村民看到李植庭起早贪黑地为学生操劳，便主动凑了四十吊钱作为薪金送给他。他却分文不取，把这笔钱当做教学和冬季学生取暖的费用。年底结算时，除支出还倒欠十吊钱，李植庭自己又拿出钱补上。

事在人为，信人不信天

1914年，寿光师范传习所在双凤学校三里地外的王高，设了一处分校。43岁的李植庭一面当老师，一边当学生去王高参加学习。为保证“教”“学”两不误，他安排好好学生自习作业后，再跑去



1955年，植庭学校教师合影(中坐者为李植庭)

听课。

听完课再跑回双凤，给学生讲书，并把学到的新教学法运用于实践。村里人劝他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，他回答说：“我这叫边学边教，现蒸热卖，来回奔波，有劳有逸，教书、念书、锻炼三不误。”

1917年，双凤学校第一期初级小学生毕业，成绩喜人，家长满意。为进一步提高学生文化水平，李植庭又发动群众办高小。除了面临建小学之处的困难外，最闹心的是校舍问题。

难中自有解决法，李植庭把目光投向了村东的娘娘庙。冒犯神灵，自己遭殃，怕破风水，全村受害等各种反对声接踵而来。这可比捐资、借房、请教师难多了！破天荒扒庙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这事谁敢领头。

可李植庭却认为扒庙有两利而无一害：一来可以破除迷信鬼神的陋俗，二来可以建设较大校院。他力排众议，顶着别人的阻拦、反对甚至咒骂，带领青年学生扒倒神像，把娘娘庙改造成有15间教室的学校。

这种破除迷信的行动，在当时的百姓看来确有“另类”之嫌，但在李植庭这儿，却十分寻常。“建植庭学校的时候，李老已经75岁了。他自己掏钱，买了一处墓地上的松林，让他的孩子们出工伐树，解板打造桌椅板凳。孩子们为他的后事着想，留下十几顶好板准备百年之后做寿材。他知道后，生气地训孩子：我壮着哩，还盼我死！死也用不着这么好的松板，给学生做桌凳，比给我做寿材舒坦！”李尊然介绍道。

孩子们只好顺从地把保藏好的寿材板抬出来，在他亲自监督下打成桌凳。村里百姓知道了后，也主动把家中用不到的桌凳，拿出来供学生使用。

1951年，已是80岁高龄的李植庭发动集资，办起寿光第一中学。5年后，他又在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，在他家乡的村头办起寿光二中。彼时，教育已不甚穷困，只是在校址选择上难以决断。

“当时最理想的校址在崔家庄前的一片高坡上，这里地势高，交通方便，离政府驻地近，购物方便，环境幽静，不巧的是这还是我们李姓祖坟所在地。”李尊然回忆道，一听说搬祖坟，李姓群起反对，破了风水，后代受害，搬坟还需另置棺木这两大难题不好解决。而教育部门为了百年大计，请李老出面支持。

搬不搬祖坟的焦点对准李植庭。他考虑再三，召集族人从商谈：“都说咱李姓祖坟风水好，可咱族里有几家过得好的，过去不是也有逃荒要饭下东北的？祖坟没动，解放后一土改不是都过得不错吗？事在人为，我们应信人不信天。将来学校建起来，咱们村的孩子上学方便，出了人才要比迷信风水靠得住。做棺木的事，我也想了，我家还有几棵大柳树，叫我家老三出力，解板打些木匣把祖宗骸骨收敛起来，埋在别处，工本我包下。大伙看这样办如何？”

这位85岁的老人，既是全族长者，又如此仗义疏财，众人罢罢，也只好领头同意。事情谈妥，当天搬移坟墓，动工建校，当年8月建起寿光二中。

追随革命，记挂教育

1920年，寿光县农村已办起400余处初级小学，县立初小还增加了女子高级班。新式学校的创办，如同给闭塞的农村开启一扇天窗，吹来一股清风，许多进步人士携带进步思想前来“布道”。

1924年，经邓恩铭介绍入党的寿光人张玉山，在张家庄创办平民学校和女子学校，开始宣传共产党的理想和政策主张。李植庭为眼前的新鲜事物深深感动，眼前看到一片亮光，激动不已。

1925年初，经中共山东地执委批准，寿光、广饶两县分别建立党支部，张玉山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。彼时，李植庭向张玉山发出邀请，请其到双凤学校任教，张玉山痛快地答应下来。

据寿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祥森介绍，执教于双凤学校的张玉山，时常给教职员们讲：“地主的所有财产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，将来总有一天没收过来分给农民。别看现在是穷人的白骨，富人的白银，穷人的黄脸，富人的黄金，穷人说话臭如美孚油，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，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是要变的。”

由于张玉山大量、广泛的革命宣传，双凤学校不少教员、学生加入党组织，并建立中共双凤学校党支部、共青团支部，使学校完全在党组织的控制下。1926年，中共寿光县委在张玉山家中成立；翌年，共青团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建立。党组织在双凤学校聚会、办训练班，讲形势、学理论，介绍苏联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经验，对



植庭学校大门

学生进行教育，把学校发展成了活动中心。

为了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李植庭表面上并不介入革命活动，但他不动声色地做了大量工作。在他的支持下，学校的一切工作，都毫不犹豫地积极配合党的任务，即使课堂教学，也不忘穿插爱国救国教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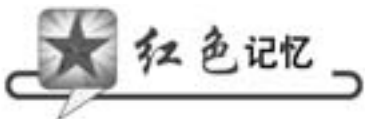
“除聘请共产党员执教，李植庭还保护革命同志，在抗战时把家中唯一的茄皮色大马捐给共产党的队伍。”张祥森介绍道，1940年6月，他参加了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，当选为副参议长。12月，他又当选为清河区第二届参议长。

1944年，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，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。这些行动上的转变，最终促成他于1946年在75岁高龄时决心入党。同年4月，渤海区党委为表彰李植庭为人民办学和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业绩，特意批准在原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校的校址上，重建学校，并命名为“植庭学校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植庭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，分管教育工作。回归老本行

这面党旗已经75岁了，在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准样式制定之前，这是山东省境内发现的——

最早的一面党旗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张国栋
本报通讯员 田宝宗

“七一”前夕，在沂水县档案局，我们看到了一面独特的党旗：党旗整面已成褐色，中间的镰刀、斧头图案也不规则，凸出，呈白色，右下角是中国共产党英文名称缩写C.C.P.，也是绣上的。局长徐兆利介绍说，这面党旗已经75岁了。省文物专家鉴定，在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准样式制定之前，这是山东省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面党旗。

据了解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，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联共(布)党旗的样式自己制作。具体规格样式不尽相同。直到1942年4月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样式作出决定：“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，左上角有斧头镰刀，无五角星，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，分发各主要机关。”这样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即在延安诞生。而沂水档案局珍藏的这面党旗，是1939年制作的。

一针一线绣党旗

党旗征集者，沂水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、75岁的窦宪诺回忆，1989年冬天，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，马头崖村刘洪秀家有一面党旗保存好多年了，就前往寻访。“来到村里，村党支部书记把我们领到两间低矮的草屋前，一位倚着屋檐晒太阳的瘦削老人站起来，村支书说这就是老党员刘洪秀。老人上身穿一件带大襟的旧棉袄，下身穿肥裆的棉裤，脚上是一双自己做的两把捂的大棉鞋。我非常惊讶，这就是当年只身闯山西找红军，对共产党矢志不渝，保存党旗足智多谋的刘洪秀吗？”

沂蒙老区，群众基础好，党组织发展得早，党的创始人、中共一大代表、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“王大耳”的王尽美就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的种子。



我省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旗，现保存于沂水县档案局。(田宝宗 摄影)

1923年，在上海大学就读的沂南苏村镇门家庵子村进步青年刘鸣鸾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加入了共产党，其间，回乡省亲便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共产党机关报《向导》周刊，就是他带到沂南的。1927年春，沂蒙山区第一个党支部——中共沂水支部建立。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了沂水、苍山、龙须阁等几次较大的武装暴动，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尝试。

1938年4月，日军大举进攻山东，国民党韩复榘政府弃人民群众于不顾，两次逃离山东战场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，高举抗日大旗，把党的主张传达给群众，从而唤起了先进分子，他们像火种一样，使党的影响不断扩大。

当时党的干部奔走在乡村里，白天下农户，晚上办夜校，讲抗日道理，教抗日歌曲，使得青年农民心里热烘烘的，纷纷报名参加抗日救亡团体。1939年春天，翻过王庄与马头崖之间的那座山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来到马头崖村，找到了刘洪秀。因为以前进村工作的同志告诉她，刘洪秀曾千里迢迢去山西找红军，还粗通文字。

几天后，赵煜琴给刘洪秀填了张表，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村里已经有几名党员，刘洪秀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。过了几天，赵煜琴又来到马头崖村，她约刘洪秀到村外一个僻静处，从背包里取出了那面党旗。

这面党旗是赵煜琴和几个女干部一针一线

亲手缝制的。党旗的底色、图案，构成了没有统一制式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。赵煜琴还摹仿苏联国旗，在右下角加了“中国共产党”的英文缩写：“C.C.P.”

“今后发展党员，新党员都要在党旗下宣誓，对着党旗宣誓就是向党宣誓。党旗交给你，用过了好好保存，许坏不许丢。”赵煜琴对刘洪秀说。同时，她又把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份誓词交给了刘洪秀。

火红的党旗引领抗日

1939年麦子熟时，日军对鲁中进行第一次大“扫荡”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、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主动从王庄撤出；秋天，日军在王庄建起了据点。马头崖村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游击小组有了用武之地。他们扛上村里原来用于防匪保家的大枪，抬着抬杆子和火药、铁砂，开到了王庄周围的山头上。大枪子弹不多，一般不打；抬杆子却不管白天黑夜，惊天动地地往王庄的日军据点里打，加上其他游击小组的参与，直觉得日本兵心神不宁，想打不敢出来，想躲又躲不开。过了没多久，敌人从王庄撤走。

游击小组打鬼子，鬼子从王庄逃走的消息，很快在王庄周围各村传开，人们更相信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正确，也更看得起自己的力量了。马头崖村发展党员、组织群众又掀起了一个高潮。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刘洪秀把收藏的党旗找出来，郑重地挂在了一个新党员的堂屋里。张学友、刘化文等七八名新党员齐刷刷地围着党旗坐了个半圈，往日碰在一块，大家的话匣子关不住，这次却谁也不说一句话，只是仰着头，眼都不眨一下地端详那面党旗。刘洪秀在众人企盼的目光中说话了，他讲那底色，讲那斧头、镰刀的含义，跟赵煜琴给他讲的一样。

第三次挂党旗也是这年冬天稍后一点时间。到年底，马头崖一个不足200户的行政村，已经有党员54名，一家有3名至4名党员的有3户。到1940年上半年，村里有十几人参军参政，投入抗日队伍。山东分局撤下的种子，不仅在马头崖村生根、开花，结果，党的发展工作也由这村扩大到杨家

的他，如鱼得水，顾不上年老体迈，不辞辛劳，四处奔走，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，积极提出兴办教育的建议。除此之外，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崔家庄，对植庭学校的大事小节时刻记挂在心上。

“他闲不住，看到需要整修的设施，能自己动手修理的从不麻烦别人。学校大门里头东侧，有一口水井，井口的砖块破碎了。学生在井口干活，容易发生意外，李老便亲自动手，将旧砖清除，垒上新砖，修整一新。”李尊然回忆道，看到教师在办公室办公，李植庭从不打扰，一旦教师有空闲，就走进办公室与教师交谈，嘘寒问暖；谈及学生，他一再告诫教师要像对自己孩子一样，学业上要严格，生活上要关怀，宽松管理，不要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。

勤俭一生，教学到底

“他善于思考，接受新事物很快。我后来到北京念书，一回老家，他就跟我打听北京有什么新鲜事。1954年，我回老家，他看到别的村搞合作社，吩咐我去跑三个合作社，抄写章程，再搞一个崔家庄的章程，下一步成立合作社用。”李尊然介绍道。

对形式主义的东西，李植庭觉得都很繁琐，没有实际意义。有时村里晚辈们去看望他，向他问好，他便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天天活着还能不好了！”叫对方下不来台。有时他在村外走走，遇到村里人到田中送饭，客套地问“您吃不？”他也没好气地回复：“我吃了你们吃啥？”

早在私塾教书时，李植庭就钟爱清代经学家洪亮吉的《治平篇》。这篇文章里透出作者敏锐的观察：人口增长太快，生活资料增长太慢，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。

由此，李植庭教育学生：“我们作为一介书生，而今无力改变社会，但可以为社会分忧。要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，一则增加社会财富，二则节省消费，即所谓开源节流。我们不能开源，则可以节流，不浪费一丝一缕。否则，如何面对父母，如何面对世人？”

“节俭”贯穿他的一生。抗战期间，他住在垦利县八大间一间土屋里，三角形的窟窿算是窗户，用荆条打的铺上，叠一卷露出棉絮的被褥，这小小的屋子是5个人办公、住宿、吃饭的场所。他乐居于此，“如果专比享受，那就是低级趣味。当然，我不是主张生活越苦越好，而是主张大伙都生活好了，我们再好也不迟。”

“晚年蜗居崔家庄时，让孩子给盖了两间屋，你说他仔细到什么程度：进门看很场面，一抬头真就出来了，原来只有屋梁是木头的，其他檩子都用竹竿代替。”李尊然回忆道。

李植庭一生唯一的嗜好是抽烟。“在困难时期，没有烟叶，他就捡拾丝瓜叶或芝麻叶吸，别人给他香烟，他谢绝。别人扔掉的烟蒂，他有时也捡起来捻碎放在簸箩里，搁烟斗里吸。有人笑话他寒碜，他哈哈一笑说，节约是一种美德，我不怕别人说闲话。”

对自己作“C”自评，对教育却十分大方。李植庭为教育自掏腰包投入几何，现在已无法统计。李尊然在1982年搜集李植庭的有关资料时，在植庭学校图书室里意外地发现一个陈旧的档案袋，里面装着一组稿纸，其中一张蓝格的稿纸上记录着一组数字，恰好是李植庭从1950年到1963年为办学捐资的情况，共计3859元。

“这张稿纸上许多时间都详细到日。从内容看，大到扩大地基，购买学校生产基地，小到购买树苗、书籍，他都无一例外地自掏腰包。他一直认为，穷人的孩子也要上学，对困难教师和学生，他都会尽全力资助。”李尊然回忆道。

1964年，李植庭在崔家庄驾鹤西归。老友们的挽联“勤一生，俭一生，勤俭一生；教到底，学到底，教学到底”，如镜子般映照他的人生足迹。

峪、塔井峪、松柏崖、石棚等村。火红的党旗引导着他们，成为各村抗战的带头人。

夫妻舍命护党旗

为了保护好这面比命还重要的党旗，刘洪秀一直把它缝在身上。1942年，他被调去脱产做情报工作，党旗没法带在身边，只好放在家里收藏。听说村子被国民党军队和杂牌机关占了，他坐卧不宁，走走跑跑，两个来小时，刘洪秀赶到岳父家，见到妻子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没把东西带出来？”妻子知道刘洪秀指的什么，忙说：“没见我的话。”刘洪秀明白了，党旗还在家里。他转身就往外冲，被妻子一把拉住：“人家抓你还愁找不着你呢，你能回村？我回去。”

窦宪诺曾经根据刘洪秀的回忆写过一篇文章《一面党旗》，其中有这样的细节：“妻子迈着一双小脚走出家门，在刘洪秀深情的注视下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寒风呼啸，吹在脸上像刀割。刘洪秀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开始担心妻子过沟爬崖碰着摔着，后来担心妻子回村取东西被坏人发现……想到这里，刘洪秀冲出岳父的家门，冲向被风雪、暮霭笼罩的山道。一溜一擦地奔到那座最高的山下，就一遍遍地喊：‘孩他娘，我来了！’‘孩他娘，我来了！’在最陡的一段山坡上，刘洪秀终于听到了妻子了！断断续续的呼叫：‘孩他爹，孩——他——爹！’他蹲到雪地上哆嗦一滑，来到了手脚无力正往上爬的妻子跟前，一把扶起妻子，妻子也无力地靠到丈夫的身上：‘旗，我拿回来了！’丈夫伸手在妻子紧抱着的胸前一摸，正摸到了党旗上不知是斧头还是镰刀的一角，那上面带着妻子的体温……”

回到岳父家，刘洪秀把内弟杨洪喜叫到跟前。杨洪喜是由姐夫介绍加入共产党的，两人互相信任。刘洪秀说：“你胆冒着生命危险把党旗从家里取出来，现在交给你保存。这是上级党组织交给咱的，咱有在就有她在。这是咱的命根子。”杨洪喜把党旗藏在屋笆里，刘洪秀回来看看说：“万一敌人来烧房子怎么办？”杨洪喜把党旗藏在地下，他又怕霉了，烂了。后来两人商量做了一个梧桐木匣子，把党旗装进去封好，藏在自家附近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。

刘洪秀把党旗完好无损地保存了50年，直到窦宪诺的到来。

1989年底，沂水县专门安排了一个献党旗仪式。窦宪诺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景：刘洪秀眼里噙着泪花，长满老茧的手颤抖着，一遍遍抚摸着党旗的边边角角，哆嗦着嘴唇喃喃地说：“你要离开我了，你就是我的命，有你在我就在，有我在你就在……”